

岛国图书传友情

(北京图书馆) 戚志芬

1982年4月的北京春意正浓,我们接待了以菲律宾国家图书馆馆长为首的一行五人访华团,来我国访问。这些来自太平洋美丽花环——菲律宾群岛的客人,在京期间,作报告、举行座谈,互相交流了两国国家图书馆的情况,和两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有益的经验,给图书馆界增添了学术交流的热潮和热情友好的气氛。访华团此次来访,不辞千里迢迢旅途之劳带来了一批珍贵的图书,这对发扬中菲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,促进中菲两国文化交流,增进相互了解,都是很有意义的事。

这批图书有四十多种,其中大部分是与何塞·黎萨尔有关。大约可分几组:一是黎萨尔自己的著作,一是黎萨尔的通讯集,还有的是为纪念黎萨尔而写的传记、论文和讲演,以及有关的国际会议会议录等。为了了解这批图书,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何塞·黎萨尔其人。

何塞·黎萨尔是菲律宾的民族英雄,是19世纪末唤起菲律宾人民民族觉醒的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。他于1861年6月19日诞生于菲律宾内湖省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富裕的地主家庭。早在黎萨尔出生三百多年前,菲律宾就落入西班牙殖民者的魔掌,菲律宾人民受着西班牙的奴役和残酷统治。在他还不满十一岁的时候,他的母亲受诬被捕,这件事给了他很大打击。加上周围菲律宾人民受压迫的悲惨情景,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迹。1872年菲律宾甲米地的工人、士兵和农民举行起义,提出打倒“西班牙”的口号。这次起义遭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,殖民当局还趁机杀害了主张改革和教会

菲律宾化的三位爱国神甫。面对残酷的现实,黎萨尔思想上有很大震动。从此,他决心为民族存亡而呼喊。

青年时期的黎萨尔,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文化活动,开始从事文学创作。十八岁时,发表了著名的诗篇《献给菲律宾青年》,宣传爱国主义思想。第二年,又在一个讽刺剧里,嘲笑西班牙教士的伪善,和殖民当局的残暴,因而遭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迫害,于1882年不得不逃亡欧洲。他抱着拯救民族的壮志发愤读书,在西班牙、法国、德国攻读医学、文学、哲学、历史和心理学,获得广博的学识,掌握了二十多种语言。这期间,他虽然远离祖国,但时刻关注着菲律宾人民的斗争和民族的命运。他和其他潜逃国外的菲律宾爱国志士一起,组织团体,创办刊物,在国外掀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“宣传运动”。他们揭露西班牙殖民者的种种暴行,和天主教神甫的罪孽,提出争取法律上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平等,保障结社、言论自由的权利,并要求驱逐西班牙教士,和教会菲律宾化。同时大力唤起菲律宾民族自豪感,驳斥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历史的诋毁,对菲律宾人认识自己的历史,提高民族自尊心起了重要作用。其中黎萨尔的文章,贯穿民族主义思想,文笔犀利,切中时弊,成为“宣传运动”中最杰出的代表和最有影响的鼓动家。

对推动菲律宾民族意识觉醒,影响最大的是黎萨尔写的两部政治小说:一是1887年在柏林出版的《不许犯我》,二是1891年在比利时出版的《起义者》。为此,1887年7月他回到祖国,为殖民当局所不容,不得不

重返欧洲。1892年6月又经香港回到菲律宾。同年，7月3日在马尼拉召开“菲律宾联盟”成立大会，幻想通过和平和合法途径，把菲律宾建立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，并发展民族经济与改良社会制度。但在“联盟”成立后的第五天，黎萨尔就遭逮捕，被流放到棉兰老岛达比丹要塞。他所组织的“联盟”也随之解散。但联盟成员波尼法秀在黎萨尔被捕的当天（7月7日）成立了“卡蒂普南”（即民族儿女最高贵的协会）秘密的革命组织，它抛弃了改良主义路线，揭示以武力推翻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，建立革命政权的路线。黎萨尔在达比丹的四年流放期间，与外界断绝了联系。他创办学校、医院和农场，在教育、卫生、供水、医疗等方面为当地人服务，并教导农民应用农业科学技术，自己也从事一些科研工作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，1896年，“卡蒂普南”的革命力量迅速强大，革命风暴即将来临，波尼法秀曾派代表到达比丹秘密会见黎萨尔，动员他参加和领导革命。但他以革命条件尚未具备，主要缺乏武器和金钱为理由，拒绝参加武装起义。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，不能轻举妄动，耽心这时进行暴力革命会受到镇压，菲律宾民族会因此遭到浩劫。同年，当黎萨尔前往古巴当军医的途中，菲律宾爆发了“卡蒂普南”领导的武装起义。革命风暴迅速漫卷整个菲律宾群岛，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战争。西班牙殖民当局恐慌万分，对起义进行血腥镇压，甚至对与这次起义无关的黎萨尔，也以“组织非法团体”，和“通过他的写作煽动人民叛乱”等罪名，押回马尼拉，判处死刑。对于死，黎萨尔无所畏惧，早在1888年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写过：“一个人被枪杀，被绞死，接着站起来的将是二十个人，三十个人，继续他的事业，重新迎着死亡前进”。临刑前夕，他写了一首绝命诗《我的最后告别》，这首诗悲壮感人，充满爱国激情和献身精

神，以及对祖国菲律宾最后必胜的坚强信念。诗云：“朝霞绚烂正漫天，我洒碧血更尽染；莫道黑夜难为明，且看皎日当空悬。”

1896年12月30日清晨，黎萨尔英勇就义，时年35岁。黎萨尔的死，激发了千百万菲律宾独立战士更加勇猛地与敌人搏斗。

黎萨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，他为捍卫菲律宾的民族利益和祖国的自由事业，战斗了一生。最后面对西班牙刽子手的死亡威胁，正义凛然，昂首挺胸，视死如归，用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去殉祖国的自由事业。因此深得菲律宾人民的崇敬和爱戴，他的名字成为争取菲律宾独立和自由的象征，称他为民族英雄。菲律宾政府把黎萨尔的诞生地区称为黎萨尔省，把他殉难的巴贡巴扬广场，命名为黎萨尔广场，树立黎萨尔铜像和纪念碑；并把他殉难的日子（12月30日）定为“黎萨尔日”。多数菲律宾人，每年两次为黎萨尔扫墓（生日和忌日）。1961年黎萨尔诞生一百周年，特成立全国黎萨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，隆重纪念，并出版八卷本《黎萨尔著作集》。

通过前面的介绍，菲律宾客人赠送的图书中，大部分是有关黎萨尔的，这就不难理解了。在这批图书中，黎萨尔自己的著作有：黎萨尔百年纪念委员会编选，民族英雄委员会出版的《黎萨尔诗文选集》，有百年纪念版的《黎萨尔散文集》和《政治历史著作集》等。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有《不许犯我》和《起义者》原手稿摹真本各一册，这是很珍贵的。

《不许犯我》（英译：《社会毒瘤》）是1887年3月29日在柏林出版的，黎萨尔第一部用西班牙文写的长篇小说。实际上他是以本身的生活经历为素材，主人翁伊瓦腊是黎萨尔本人的自我画像或化身。在书中，黎萨尔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和天主教修士的黑暗、反动。描述了在殖民

奴役下菲律宾人民的苦难和悲惨生活。同时通过各种人物之口，呼吁西班牙殖民当局实行必要的改革，这部小说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黎萨尔的政治观点。尽管如此，它引起了西班牙殖民当局和反动修道会的惊恐和仇视，认为《不许犯我》是“异端的”是“有害于西班牙政府及其在菲律宾的政策”。因此列为禁书，严禁输入菲律宾，同时对黎萨尔的亲属横加迫害。作为《不许犯我》的续篇，黎萨尔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起义者》，于1891年9月18日在根特出版，黎萨尔把这部小说献给1872年殉难的戈麦斯、布尔戈斯、萨莫拉三位爱国神甫。封面上有三位神甫像，献辞中称他们三人为“烈士”，并谴责西班牙殖民者双手沾满了鲜血，这无疑是向西班牙殖民者公开挑战。《起义者》的主人翁席蒙，是伊瓦腊在国外流亡十三年之后改的名字。他与伊瓦腊不同，不主张改良，而要密谋暴动和起义，企图同殖民政府与修道会决一死战。但又不彻底的，失败后服毒自杀。这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黎萨尔。当时他看到西班牙拒绝实行改革，菲律宾人民的生活更加恶化，因而他对继续宣传、呼吁、请愿产生了幻灭之感，觉得有必要探索新的出路，但思想上存在着许多矛盾冲突。此书出版后，装箱寄去香港，设法偷运去马尼拉，但许多箱都被没收。黎萨尔这两部作品的思想意义，在于它严肃地提出了当时菲律宾社会现实中的各种尖锐问题，倾听了菲律宾民族在火坑中痛苦呻吟，和菲律宾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和探索，概括地体现了十九世纪末，菲律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民族生存探索道路的精神面貌。这两部小说在当时所起的作用，不能低估。因此，当它们偷运回菲律宾时，西班牙殖民当局视为洪水猛兽，宪兵日夜不停搜查这样书籍，并加以销毁。读他的书的人，一经查出，即遭监禁。但是野火烧不尽，不仅知识分子争相阅读，甚至边远地区的农民，也去找识字的人，把小说的

一些章节，译成他加禄语，讲给他们听。不可讳言，这两部小说，对促进菲律宾民族的觉醒，对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起了很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。因此，菲律宾独立后，他的书被定为学校必读书。

在我国，黎萨尔和他的小说并不陌生。鲁迅先生在早年研究和介绍被压迫和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文学的时候，就曾多次提到黎萨尔的名字。1918年，鲁迅在《随感录》这篇短文中，说到他“总最爱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，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”，其中“最注意的是芬兰、斐律宾、越南的事”，然而“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（即黎萨尔——引者）的小说”。后来在《杂忆》一文中，鲁迅又一次提到这位“飞猎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（即黎萨尔——引者）。”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，黎萨尔的两部小说，为我们提供一幅殖民地社会形象的历史图画，是我们了解菲律宾人民斗争历史的一部好教材（都有中译本）。此次菲律宾友人把这两部小说的原稿摹真本赠送我们，情谊是深重的。

这批图书中，围绕黎萨尔的另一组赠书，是黎萨尔的通讯集。其中有：《黎萨尔与改良主义者的通讯》，时间包括黎萨尔潜赴欧洲的1882年起，到1896年，黎萨尔生命的最后一年止。人物包括：在“宣传运动”中的一些骨干分子，如：曾被黎萨尔推荐参加指挥革命军的安东尼奥·卢纳，曾写过孙中山传记的著名宣传家、历史学家马里安诺·彭西，以及宣传运动的演说家洛佩斯·哈恩纳和编辑宣传运动机关报《团结报》的马塞洛·H·德尔皮拉尔等等。此书1963年，由黎萨尔百年纪念委员会出版。另一种是《黎萨尔——布卢门特里特通讯集》，此书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1886到1889年，第二部分是1890到1896年。1961年由黎萨尔百年纪念委员会出版，共两册。菲迪南·布卢门特里特是奥地利学者，又是黎萨尔的最好朋

友，他同情菲律宾的正义事业，也为《团结报》撰稿，支援“宣传运动”。曾为黎萨尔考证注释的《菲律宾群岛史记》一书写序言。黎萨尔1889年在巴黎成立“国际菲律宾学家协会”时，由布卢门特里特任主席，他自己任秘书。布卢门特里特曾为《不许犯我》辩护，也关注《起义者》的写作，至今我们在《起义者》原稿摹真本的书名页上，还可看到布卢门特里特的字迹。《起义者》在根特出版后，黎萨尔马上把初版送给他。布卢门特里特曾写《黎萨尔传记》载《人类学的国际文献》专号补篇，第10卷，于黎萨尔殉难后第二年，1897年在柏林出版，书中称他是“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马来人”。黎萨尔在生命最后一刻，临刑前夕，写信给他的父母、兄弟，同时也写信和他最好的朋友布卢门特里特告别，可见黎萨尔和他的亲密友谊。还有《黎萨尔与亲属通讯集，1876—1896》以及《多种通讯集》，由民族英雄委员会于1963，1964年出版，不一一细述。

赠书中有关黎萨尔的第三组，是为纪念和研究黎萨尔而出版的多种图书，包括黎萨尔的传记、会议及讲座等。如：《第一个菲律宾人——黎萨尔传记》、《国际主义者黎萨尔》等。还有1961年黎萨尔诞生一百周年时，于12月4—8日，举行的关于黎萨尔国际会议的《会议录》和《文件集》，以及近几年来，每逢黎萨尔忌日（12月30日）举行黎萨尔讲座的历届年报，都是了解和研究菲律宾这位民族英雄黎萨尔的可贵文献。

赠书中除上述有关黎萨尔的图书外，还有一组是菲律宾革命文献和有关人物传记。其中有：《1898年6月12日与有关文献》（1898年6月12日是菲律宾独立战争胜利，脱离西班牙统治，宣布独立的日子。）还有《卡蒂普南的会议纪录》、《第一个菲律宾外交家费里佩·阿贡西洛1859—1941》、《格里戈里奥·H·德尔皮拉尔将军的生与死》、以及《革命的智囊阿波利纳里奥·马

比尼（1864—1903）画传》、《马比尼书信集》等。德尔皮拉尔将军是在菲律宾独立战争中抗美救国而壮烈牺牲的，为此他赢得历史上“菲律宾的李奥尼达”称号（李奥尼达，斯巴达国王，希腊历史上的英雄）。后两书，第一种是1964年为纪念马比尼诞生一百周年，由民族英雄委员会编印的。第二种也是民族英雄委员会编译1965年出版的。马比尼，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，是反对缔结破石洞条约的少数领导之一。西美战争爆发后，他曾写宣言，主张一切革命力量总动员起来，劝告人民要清醒：美国人和西班牙人一样，都在觊觎菲律宾这颗东洋的美丽珍珠，主张同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。1898年6月12日菲律宾宣布独立后，他任阿奎纳多的顾问，是1898—1899年革命政府的主要设计者，阿奎纳多的法令和演说大多由他执笔，曾正式被任命为内阁主席兼外交部长。由于他的聪明才能和爱国心，被菲律宾史学家称为“菲律宾革命智囊”。但他后来悲观失望，仍落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行列。他的著作《菲律宾革命》，由特奥多罗·M·卡劳编成两卷，1931年出版。

在这批赠书中，还有关于马尼拉地方历史的一套图书，如：《马尼拉的华侨》、《革命时期的马尼拉》、《独立后的马尼拉》等，以及其他图书，限于篇幅，不一一细述。

在这批图书中还有一种值得大提特提的是《基督教义》。这本书从内容来说并不值得介绍，但它是1593年菲律宾印刷的第一本书，而且与中国有关，它是中菲文化交流的见证。根据菲岛总督戈麦斯·庇列斯·达斯马列那斯在1593年（明万历二十一年）6月20日，从马尼拉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律浦第二的信上说，因为急需，这次特许印刷《基督教义》，一本是岛上最好的语言他加禄语，一本是中文。这是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介绍到菲律宾的开始。而岛上的第一个印工，是马尼

拉天主教多明尼各教会的一个中国教徒，教名是约翰维拉，可惜中国名字已不可考。1593年出版的中文与他加禄语两个译本的《基督教义》就是他木刻的。此书原认为早已失传了，现在已被陆续发现。这次赠送的一本是他加禄语的，1973年由菲律宾历史委员会影印。菲律宾友人把这一由中国印工木

刻，菲律宾印刷的第一本书的影印本送给我们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岛国图书传友情！所有这些珍贵的图书，对促进中菲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，都将起着作用，并将被我们国家图书馆所珍藏，为子孙后代所永世享用。

一八九六年十二月黎萨尔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杀害，临刑前，他写了一首诗，藏在刑室的蜡台底下，才保存下来，成为菲律宾家喻户晓的名作。其中有这样一段：

假如要用我的鲜血去增添黎明的绚彩，
拿去吧，为着你的宝贵的需要，
让它的殷红染上那使人觉醒的光芒！

方见天际破晓，	有我鲜血在此，
我即与世长辞，	任凭祖国需要，
朦胧夜色已尽，	倾注又何足惜，
光明白日将至，	洒落一片殷红，
若是天色黯淡，	初升曙光染赤。

这是黎萨尔绝命诗《最后告别》的一节，译文据陈尧光：《菲律宾爱国者的声音》，1978年2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。